



四大奇书与中国大众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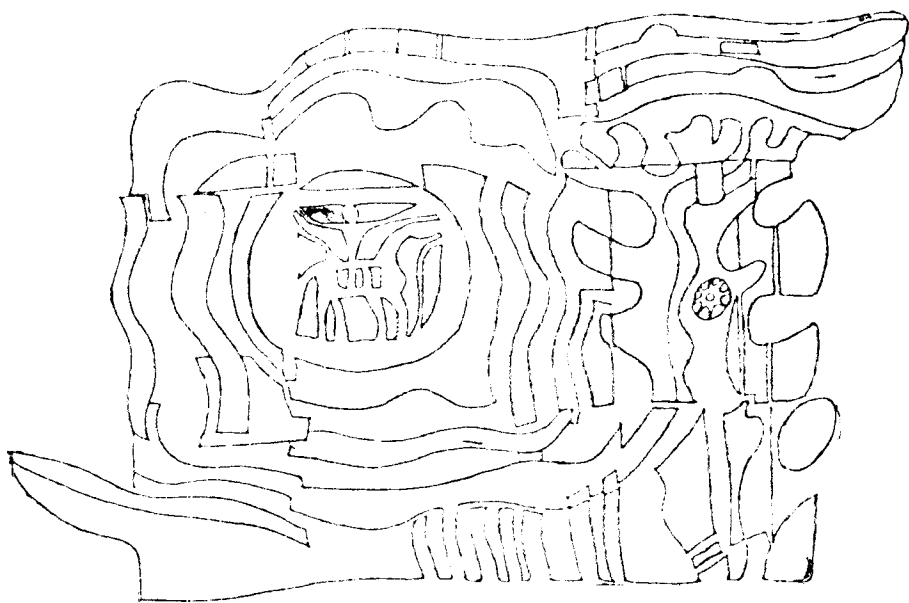
王齐洲



湖北教育出版社

四大奇书与中国大众文化

王齐洲



湖北教育出版社

(鄂)新登字 02 号

四大奇书与中国大众文化

© 王齐洲 著

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430022·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63*)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文字六〇三厂印刷

*

850×1168毫米32开本 11.5印张 5插页 242 000字

1991年6月第1版 1994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3 501—6 050

ISBN 7-5351-0611-0/G·467

定价：(精装) 10.50 元

序

李修生

齐洲同志《四大奇书与中国大众文化》一书完成后，要我为其写一篇序文，并希望摒弃套语、空话，最好能谈一点与该书内容有关的实质性问题。他的话说得虽没有这样直白，却很有分寸，意思清楚明白。我自然应该答应下来，也很高兴答应下来，但他要求的内容却是我一时难以做到的。明代“四大奇书”涉及的问题很广泛，许多问题我也正在思考之中；文化人类学，我只读过一些入门的书，还谈不出什么来。我能做到的只能是说几句真话、实实在在的话罢了。所以，我想谈谈齐洲同志选择从文化角度论“四大奇书”的原由。

齐洲同志近几年来发表有关明代文学的文章十余篇，并编有明代文学教材。其中部分文章在发表时便已读过，但我们真正见面却是去年在河南信阳召开的“建国以来四十年古典文学研究反思研讨会”开会期间。反思会，不言而喻是对走过的路进行回顾，最终的目的是为了展望未来的路。我们的话题自然从四十年开始，直谈到如何进行新的尝试，我们有相当多的看法是相同或相近的。所以，我相信，我有可能说清楚他写这本书的起因。

关于建国以来四十年的古典文学研究，我有一个发言，他

曾表示同意。所以，我将要点摘录在这里：

四十年，在人类以千年计算的文明史上是短暂的一瞬，在文学史和文学史学史上出现四十年的间断（即便四十年中无甚成果可言），也是很普遍的现象。建国以来的四十年，古典文学研究的实绩是很丰厚的，然而要真正科学地评价或描述这四十年历程，还需要我们对四十年里留存的许多曾经在我们头脑中占有位置的东西进行整理。因为在当时占有地位的人和事，未必会在历史上占有篇章，许多喧闹一时的东西仅是表象幻影。正是“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历史上这种情况是人们熟知的。我们要评论的是在这四十年中撰著的真正有科学价值的，已经发表和将会得到发表的古典文学研究论著。

四十年，对经历了这段历程的研究者来说，它是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它可能已经决定一个人一生的面貌。人们会对经历的一幕又一幕的事件带有浓厚的感情色彩。从漫长的时空中可以寻求解脱，也可以认识到生命的真正意义，进行哲理的探寻。与国家发展的要求和相邻各门学科发展相比较，可以得到启示，也会产生危机感。回首自身的经历，可能汇集辛酸泪，也会产生荒唐言。总之，这四十年留给我们思考的问题真是太多了。但是，我们要想推进学科建设，就必须采取冷静的科学的态度。

四十年，古典文学研究一直与时代条件紧密联系着。“五四”，是中国思想文化界一个划时代的变化，为四十年奠定了思想文化基础。一九四九年共和国成立，又是一次重大的变化；一九七八年，思想解放，又带来一次巨大的变化。每个时期都有每个时期的学术，一直传承下来的则是追求科学真理

和严肃治学的传统。曾经出现过否定人类一切进步文化的思潮,曾经出现过只能“代圣贤立言”的思路,曾经出现过“全盘西化”的冲击。这些都不可能阻滞研究工作的前进,事实上,研究工作也在不断开辟前进的道路。只有从大历史观去审视它,才能对四十年古典文学研究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才能为新时期的古典文学研究找到正确的答案。

对于当前的古典文学研究,应当看到它不同于以往的新特点。古典文学研究者,吸收现代科学中一切有利于自身发展的观念和方法,拓展自己的研究领域,寻求古典文学研究与现实的联结点,这些尝试都是有益的。在这次会议上,齐洲同志做了《强化古典小说研究的文化意识》的发言,这又是我们共同关心的一个话题。文化问题、文化人类学,都不是今天才提及的问题。文化问题,七十年来在中国国内已经历了三次大的讨论。文化人类学诞生已有百余年历史。正如齐洲同志在会议上的发言中所说:

提倡强化古典小说研究的文化意识,并不是因为文化是时下的热门话题,我们便赶“时髦”;也不是由于谈论文化比谈论文学更省力。广义的文化的确可以包容人类环境中由人所创造的一切,因而容易为大而无当的空泛议论留下足够的活动空间。然而,狭义文化即文化的核心部分却是一切人文科学工作者必须关心的内容。“文化基本的核心由两部分组成,一是传统(即从历史上得到并选择)的思想,一是与他们有关的价值。”([美]A·L·克罗伯、C·克鲁柯亨语)古典小说是古代作家对他们时代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记录,表现了当时人们的思想观念与价值观念,这便为认识和了解我们民族传统的思想和价值提供了活生生的例证,为现代文化的发

展提供了历史的参照。早在半个世纪前，鲁迅便指出：“中国确也还盛行着《三国志演义》和《水浒传》，但这是为了社会还有三国气和水浒气的缘故。”^①经历五十多年的风风雨雨，“三国气”和“水浒气”，即是说，《三国志演义》、《水浒传》等古典小说所表现的传统思想和价值观念，仍然影响着社会，今天人们的文化心理状态与《三国志演义》、《水浒传》中的一些人物的文化心理状态，有着某种精神上的联系。古典文学研究者有责任去清理这些联系，去揭示思想与价值的发展轨迹，为新文化建设提供依据和借鉴。

古典文学研究工作者不仅要將古典小说放在诞生它们的具体文化背景下按照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去认识它们，而且要用现代文化思想的利刃，正确地评价它们。随着文化建设的不断深入，随着新的思想和价值体系的逐步建立，文学本体研究必将愈来愈为人们所重视。到那时，清醒的文化意识已渗透在文学本体研究之中，古典小说研究也就会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位置。

齐洲同志不仅这样想，这样说，而且着力去做。我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万事开头难”，就看我们有没有勇气、信心、热情和能力实实在在地迈出第一步。有了第一步，就会有第二步，第三步。开创性的工作可能有若干不足，但这是前进的起点，是新事业的开端，值得我们大家重视。齐洲同志的《四大奇书与中国大众文化》就是在这样的认识和期待中产生的。如果它能促进这方面的研究，和引起对某些问题的讨论，这是值得齐洲同志和我们大家欣喜的。

① 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叶紫作〈丰收〉序》。

我把我们交换过的看法原原本本地写在这里，也许会有助于了解齐洲同志这本书的写作意图。是为序。

1990 年立春日 于北京

目 录

序	李修生(1)
绪 论 文学与文化	1
第一章 四大奇书的诞生与大众文化的发展	30
一 中国大众文化的发展	30
二 四大奇书的成书过程	41
三 明代社会的历史特点	56
四 四大奇书的文化意义	66
第二章 四大奇书与大众价值取向	77
一 价值与价值取向	77
二 《三国演义》的价值取向	83
三 《水浒传》的价值取向	89
四 《西游记》的价值取向	96
五 《金瓶梅》的价值取向	101
六 价值取向的历史演进	109
第三章 四大奇书与大众道德观念	117
一 三姓家奴吕布的悲哀	117
二 许田射猎与携民渡江 —— 忠君与爱民	123
三 徐庶见母与李逵背娘	

D2 53/02

	——敬老与孝亲·····	130
四	桃园结义与梁山聚义	
	——恩义与仇怨·····	135
五	温娇从贼与玉楼改嫁	
	——贞操与权变·····	141
六	金箍棒与紧箍咒	
	——扬善与惩恶·····	147
第四章	四大奇书与大众政治思想·····	155
一	从乱自上作谈起·····	155
二	合久必分与分久必合	
	——规律与逻辑·····	161
三	拥刘反曹与替天行道	
	——仁政与暴政·····	166
四	排座次与成正果	
	——等级与秩序·····	173
五	割发代首与自贬三等	
	——法治与人治·····	179
六	论秤分金银,换套穿衣服	
	——平均与平等·····	186
第五章	四大奇书与大众宗教意识·····	194
一	武侯显圣的宗教意蕴·····	194
二	猴王出世与太宗入冥	
	——起源与归宿·····	200
三	司马废帝与刘全进瓜	
	——报应与轮回·····	206
四	鲁达出家与公孙下山	

——出世与入世·····	212
五 刘谌祭祖与月娘求子	
——血缘与宗法·····	218
六 明心见性与立地成佛	
——修心与修身·····	224
第六章 四大奇书与大众审美理想·····	233
一 美丑妍媸话英雄·····	233
二 七擒孟获与三败高俅	
——内圣与外王·····	239
三 过关斩将与杀嫂祭兄	
——作为与承当·····	245
四 大闹五台与龙宫借宝	
——自然与真率·····	249
五 舌战群儒与计调芭蕉	
——机辩与谐趣·····	254
六 梁山英雄与取经队伍	
——驳杂与均衡·····	260
第七章 四大奇书与大众生活态度·····	266
一 魏延反骨的由来·····	266
二 猴王游学与孔明躬耕	
——充实与完善·····	273
三 王英成亲与西门娶妾	
——纵情与节欲·····	280
四 义释严颜与利结蔡蕴	
——用智与守拙·····	288
五 林冲上山与武松打虎	

——顺应与改造·····	295
六 六出祁山与八十一难	
——理想与奋斗·····	301
第八章 四大奇书与大众思想方法·····	307
一 五行山下悟空的思考·····	307
二 孔明禳星与唐僧历难	
——天道与人道·····	311
三 悟空正果与宋江享祭	
——求名与求实·····	317
四 柴进疏财与瓶儿厚葬	
——物质与精神·····	322
五 宝阁传经与功臣被害	
——理想与现实·····	329
第九章 四大奇书与新文化建设·····	336
一 四大奇书的现代命运·····	336
二 大众文化前景展望·····	347
后 记·····	357

绪 论

文学与文化

文化，这个富有诱惑力的字眼，牵动着人类敏感的神经。一个民族的生存和发展，追求和困惑，力量和创造，光荣和落漠，都与文化问题息息相关。近代以来，人类对文化问题的关心超过了以往任何时代，这种现象，正是人类理性发展日臻成熟的重要标志。

中国的现代历史便是从文化变革开始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次伟大的文化启蒙运动，也是一次实实在在的社会革新运动。中华民族从来没有象“五四”时期这样严厉地批判自己，也没有象“五四”时期这样全面地吸收外来文化，尽管这种批判和吸收中常常伴随着感情与理智的纠葛。当人们满腔热情地将“德先生”和“赛先生”^①请进被帝国主义用枪炮轰开的中国大门的时候，满目疮痍、民不聊生的社会现实不允许人们冷静地对待中国传统文化，改造社会、救亡图存的呼号压倒了一切非政治性的要求，“德先生”和“赛先生”无暇顾及对传统文化心理与文化性格的改造，因而未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① “德先生”和“赛先生”即“民主”和“科学”，是据英文 democracy（民主）和 science（科学）的首音化出，加先生以示尊崇之意，为当时常用语。

然而,“五四”新文化的火炬却点燃了我们民族的希望,“五四”时期所提出的建设新文化的理想以及人们为实现理想而献身的精神,成了中华民族不朽的灵魂。中华民族在痛苦的反思中认识到了改造传统文化的重要性与艰巨性,也明白了建设新文化的必要性与紧迫性。他们以前所未有的勇气和气魄,从西方文化中引进了代表人类最杰出、最进步的文化成果——马克思主义,并将它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从此,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代。

古代和现代的中国历史无可辩驳地证明了文化变革与社会变革的紧密联系。时至今日,谁也不会怀疑文化对于一个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八十年代在中国大地上出现的又一次“文化热”,正是在中国与世界发达国家的差距愈来愈大、中华民族又一次面临生死存亡的严峻考验的形势下,在顺应国际改革大潮和适应国内改革开放要求的气候下,自然地发生的。它决不是某些人的心血来潮,而是社会现实的客观需要。应当承认,由于理论准备的不足,由于现代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地发展所带来的思想观念的不断更新,由于历史的巨大惯性所造成的社会心理障碍,目前的文化研究与文化建设都遇到了一定的困难,中华民族又面临着一次新的挑战。然而,困难与希望并存,挑战与机遇同在,一切不甘沉沦、爱国图强的炎黄子孙,都应该振作起来,为建设我们民族的新文化、促进民族发展与社会进步,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一个民族要建设适应社会发展要求的新文化,离不开对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的批判与继承。躺在传统文化上睡大觉的民族固然是一个没有希望的民族,而彻底抛弃文化传统的民族同样是一个没有希望的民族。要批判地继承我们民族的

文化传统,就必须对传统文化进行科学分析,而为了分析传统文化,我们必须首先确定传统文化的范畴并找到探讨传统文化的途径。

“文化”的概念,在我国西汉时期即已出现。《易经》中有“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①的话,这里的“人文化成”便是我国“文化”概念的滥觞。唐代孔颖达对“人文化成”的解释是:“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者,言圣人观察人文,则《诗》、《书》、《礼》、《乐》之谓,当法此教,而化成天下也。”^②按照孔颖达的理解,“人文化成”即以儒家传统典籍为依据,来教化人民形成良好的风俗习惯。所谓“文化”,也就是文治教化。应该说,孔颖达的解释颇为准确地揭示了传统“文化”概念的内涵。西汉刘向《说苑·指武》所说“圣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后武力。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正是这个意思。在我国,对“文化”概念的这种理解一直保持到近代,直到十九世纪末从日文转译进西方“文化”概念之后,“文化”的涵义才发生了一些变化。我们今天所使用的“文化”概念,可以说是我国传统文化概念与西方文化概念的结合。

西方“文化”一词来源于拉丁文 cultura,最初指土地的开垦及植物的栽培,后来指对人的身体、精神、特别是艺术和道德能力的培养,亦指人类社会在征服自然和自我发展中所创造的物质和思想财富。^③十九世纪中叶,“人类学之父”英国学者 E·B·泰勒开始把“文化”作为一个专门术语使用,并给它

① 《易经·贲·彖辞》。

② 《十三经注疏·周易正义》。

③ 参见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迈尔百科全书》,1971年版。

下了一个明确的定义。他说：“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说，乃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任何人作为一名社会成员而获得的能力和习惯在内的复杂整体。人类的各种各样机会中的文化状况，在其可能按一般原则加以研究的范围内，是一个适合于研究人类思想和行为的规律的课题。”^① 泰勒之后，西方不少学者都按照自己的理解给“文化”下定义或作说明。有的说文化不外是在正当途径上发展的人类的能力，有的说文化是民族精神的表现，有的说文化是工具与制度的造作，包括从社会里所习得与传递的行为的模式，有的说文化是人类生活赖以超脱其他动物性并区别于动物生活的一切，有的说文化是理性的实体，有的说文化就是教育，等等。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众说纷纭，莫衷一是。30多年前，美国人类学家A·L·克罗伯和C·克鲁柯亨细心地检讨了160多种关于文化的界说，他们发现，这些说法都很接近，它们的差异在于各自强调概念的某一因素，以及观察问题的角度和方法不同。他们认为：“文化存在于思想、情感和起反应的各种业已模式化了的方式当中，通过各种符号可以获得并传播它。另外，文化构成了人类群体各有特色的成就，这些成就包括他们创造物的各种具体形式；文化基本的核心由两部分组成，一是传统（即从历史上得到并选择）的思想，一是与他们有关的价值。”^② C·克鲁柯亨还尝试着给文化下过如

① E·B·泰勒：《原始文化》。转摘自《多维视野中的文化理论》，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99～100页。

② A·L·克罗伯和C·克鲁柯亨：《文化概念：一个重要概念的回顾》，哈佛大学《小人物陈列馆论文集》第41期，1951年。

下定义:文化——“这一人类学术语所确定的涵义是指整个人类环境中由人所创造的那些方面,既包含有形的,也包含无形的。所谓‘一种文化’,它指的是某个人类群体独特的生活方式,他们整套的‘生存式样’。”^① 克鲁柯亨的意见,并没有得到大家的一致赞同,直到目前为止,西方对“文化”概念的理解仍然歧见迭出。这种现象,固然与西方人强调独立思考、喜欢标新立异有关,同时也说明,文化理论还不够成熟、不够系统。

西方学者对于文化概念的理解尽管千差万别,大体却可以区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的文化指打上了人类印迹的人类所创造的一切,包括有形的和无形的;狭义的文化则主要指人类的意识形态,即思想观念与价值观念。广义文化包含狭义文化,狭义文化是广义文化的核心和灵魂。

在我国,人们习惯使用的“文化”概念,也同样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文化与西方的理解大体相同。例如,说读书识字是“学文化”,称赞举止得体是有“文化修养”,管理文学、艺术、博物、图书的部门被称做“文化部门”,等等。狭义文化与西方的理解则略有差别。这是因为,我们接受的主要是我国传统的文化概念,即将“文化”理解为与武力征服相对立的“文治教化”。虽然文治教化主要是指通过典籍的学习和礼仪的熏陶而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生存式样,建立符合统治阶级要求的风俗习惯,而生活方式和生存式样的改变不能不首先是思想观念与价值观念的更新,但是,由于文治教化主要关心的是社会的伦理道德,这便使传统的文化概念中所包含的意识形

① C·克鲁柯亨:《文化概念》。转摘自《多维视野中的文化理论》,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18页。